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金融对农村 产业兴旺的影响研究

胡剑波 郑维丹¹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农村产业兴旺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十四五”时期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一环。鉴于此,本文选取2003—2019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机理及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1)农村金融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抑制了农村产业兴旺,而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产业兴旺具有正向的驱动效应。(2)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产业兴旺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关系,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机制设计存在最佳路径。(3)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产业兴旺的抑制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明显,而在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效率的提高对西部农村地区产业兴旺存在着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金融 农村产业兴旺 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2)07-0160-09

一、引言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地位。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发展农业产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必由之路。^{[1][2]}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利器,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这一方面肯定了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农村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定位于服务农业发展的农村金融能为农村产业兴旺发展提供发展资金,支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3]自2003年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合作互助社和其他形式的多层次金融体系,^[4]对我国农业发展起到了较强的支撑作用。在当前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下,如何落实好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如何发挥好金融资源配置作用,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多样化金融产品,有效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宜居建设、农民增收等重点领域以实现农村产业兴旺,^[5]是目前我国农村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发展农村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是否存在最优选择以发展农村产业兴旺?如何在不同区域推行有所区别的政策以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科学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有利于厘清我国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的指导思路,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问

¹作者简介:胡剑波,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郑维丹,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绿色金融。

题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由于农村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各国或地区需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所以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较为充分。国外的学者认为农村信贷系统的无谓损失和市场扭曲是由政府支持的企业地位造成的。^[6]因此，政府鼓励金融机构扩张分支机构，一方面可以减少贫困，^[7]另一方面也可以加速农业机械化，^[8]还有其他产业结构等方面作用^[9]促进农业发展。但也有研究认为扩大信贷供给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不大，只有在还款率足够高时农业产业信贷才能收益高于成本，^[10]而且某些地区银行对小型农户家庭福利的贡献比大型农户更为明显。^[11]由于农村产业兴旺概念提出较晚，国内学者注意力是从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开始，但究竟是促进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尚且存在学术争议。有不少学者通过全国数据得出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2]并且得出尤其是存款规模^[13]和以人均金融机构网点数^[14]表示农村金融密度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的结论。从省份数据层面来看，山东省数据支撑了上述结论，^[15]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存在抑制作用，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正式信贷等农村金融因素均对农村经济有抑制作用，^{[16][17]}农村金融规模和结构对农村经济存在抑制作用，而农村金融效率则具有促进作用。^[18]学者们在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关注农村金融对农村人均收入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农村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19]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显著变为不显著，^[20]且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21]农村金融能从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农村贷款、农业保险赔付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农村储蓄、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却是负向作用。^{[22][23][24]}

从现有研究来看，通过各类因素来刻画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而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部分学者仅将农村贷款或农业存款作为单一指标来刻画农村金融，这实际上仅考虑了农村金融中的规模因素。有的学者在研究时除了考虑农村金融的规模因素，也考虑了农业存款与农村总产值比值、农业贷款总量与农村总产值比值、保费收入比率、保险赔付比率、乡镇企业贷款比率等其他效率因素或非信贷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诠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有学者分别将金融机构人均网点数、农村人均投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更新改造投资等因素作为衡量农村金融水平的核心变量进行研究。

国内外学者选取了多个指标来刻画农村金融水平，从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进而延伸到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测算，得出了值得参考的结论，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要么仅将农村贷款作为衡量农村金融的唯一变量，要么忽略农村存款增长的综合影响，要么忽略金融的其他组成要素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要么选取了较为偏颇的农村投资水平，无法深刻解释金融影响农村产业兴旺的本质。同时，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是线性关系，鲜有学者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而忽视了在农村金融问题中可能存在的最优路径选择问题。现有研究中仅有谭崇台、田杰和孙玉奎等学者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与农村产业兴旺或农民收入的问题进行了研究，^{[4][14][21]}且数据选取时间距离现在较远，最近的时间节点仅到2009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均使用全国数据，鲜有针对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也无法针对不同区域给出政策建议。基于此，本文主要贡献在于：(1)转变传统对农村金融的构建角度，将农村金融细分为规模、结构和效率，综合考虑存款、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等因素，进而分析农村金融水平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2)现有研究中基本都是线性考虑农村金融水平的影响，但实际上受制于农村社会投资回报水平、不平衡的城乡金融格局以及其他非金融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在选择金融发展路径上存在着最优区间或最优路径。(3)考虑到我国区域广阔而农村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本文进一步从地区效应进行分析，考察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异质性影响。

三、研究假设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取得如此经济成就的动因之一在于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在内的其他产业发展，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是过去多年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下，形成了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的城乡不均衡现状：从产业格局来看，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制造业、进出口加工业、服务业都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多为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投资回报率相对不高，又受制于地理环境、技术手段、人力资本等因素，我国农村产业呈现企业少、规模小、不

集中、技术差等现状;从金融格局来看,在长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路径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城市对农村的资金的“虹吸效应”,农村成为资金提供方,城市成为资金使用方,进而形成城乡金融不平衡格局。换言之,农村金融规模越大,资金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现象越严重,而能够用于本地的资金就越少,能够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越匮乏。反之,农业贷款中乡镇企业贷款占比越高,说明该地区用于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越高,乡镇企业能够带动当地居民增收增产的能力也就越强。在农村地区,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比例意味着储蓄资金再分配至资金需求方的占比,衡量着社会对资金的运用效率。一旦比例过高,则意味着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速度越慢,进而制约农村地区济发展,抑制农村产业兴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a、假设 1b 和假设 1c。

假设 1a: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产业兴旺有抑制效应。

假设 1b: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产业兴旺有促进效应。

假设 1c: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产业兴旺有抑制效应。

上述假设分析了线性假设下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表面上看,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必然会改善农村产业兴旺对金融资源渴求的困境,从而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的发展,但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即社会对农村金融资源供给的分配是有效的。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是指,金融资源使用者的机会成本不高于实际的社会投资收益,因而没有激励把“让渡”给他人变成金融资源提供者。因此,仅在有效配置的前提下,金融资源才能分配到能够取得最高社会投资收益的农户或乡镇企业手里,从而刺激农村产业兴旺,而在金融资源配置无效的前提下,即使提供再多的金融资源也会因为流入并非最佳的使用者手里而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可能误导农户或农村企业在错误的技术或路线上进行投入,最终导致农村产业的恶化。随着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制度的逐步完善,更多金融机构下沉至农村地区,如不少银行在县城、乡镇甚至村、组等行政区划内成立了支行、农村金融服务站等基层组织,也研发了更多符合农村经济特征的金融产品(“两权”抵押贷款、农产品抵押贷款、农户联合贷款、乡镇企业特色抵押贷等),有利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假设 2: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产业兴旺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关系。

考虑到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在经济增长模式、主导产业结构、金融体制机制存在着巨大差异,不能一以贯之地认为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是恒定不变的。同时,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速了区域间的要素流动,省域、城乡互动联系加强,一地农村经济的增长不仅受到本地投入要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周边邻近地区的影响。因此,我们理应考虑到地理空间因素来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rib_{it} = \beta_0 + \beta_1 rfs_{it} / rfc_{it} / rfe_{it} + \beta_n \sum_{n=2}^n X_{it} + \mu_i + \th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为进一步研究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与农村产业兴旺的非线性关系，构建模型如下所示：

$$rib_{it} = \gamma_0 + \gamma_1 rfs_{it} + \gamma_2^* rfs_{it}^2 + \gamma_n \sum_{n=3}^n X_{it} + \mu_t + \th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rib_{it} = \gamma_0 + \gamma_1 rfc_{it} + \gamma_2^* rfc_{it}^2 + \gamma_n \sum_{n=3}^n X_{it} + \mu_t + \th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rib_{it} = \gamma_0 + \gamma_1 rfe_{it} + \gamma_2^* rfe_{it}^2 + \gamma_n \sum_{n=3}^n X_{it} + \mu_t + \th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rib_{it} 表示农村产业兴旺， rfs_{it} 表示农村金融规模， rfc_{it} 表示农村金融结构， rfe_{it} 表示农村金融效率， X_{it} 表示控制变量，分别为政府支农力度(gov)、产业结构(str)、对外开放程度(open)、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irr)、自然灾害程度(natr)， μ_t 表示时间效应， θ_i 表示个体效应， $\varepsilon_{it} \sim N(0, \delta^2)$ 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需要说明的是：(1)在回归模型估计中，默认采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2)本文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对回归模型中的时间和个体进行控制。控制时间效应，目的是控制不随个体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控制个体效应，目的是控制不随时间改变但因个体而不同的遗漏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3—2019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数据可得性出发，本文数据不包含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信息网站。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农村产业兴旺(rbi)。参考张乐等的做法，^[26]本文用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该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值来衡量。之所以使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人均值衡量农村产业兴旺，是因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投入密切相关，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波动更具有稳定性。由于未能直接得到具体从事狭义农业的劳动力人数，本文选择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代替狭义农业从业人员，由此可能造成人均农业总产值指标一定程度的低估，但影响程度不大，因为第一产业中仅从事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只占少数。

2. 核心解释变量。

对于农村金融的刻画，学者们进行了深入地讨论，提出了很多指标来衡量。胡振华等^[26]以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作为刻画农村金融的重要指标。陈时兴^[27]、任碧云等^[28]认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除了金融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外，还应该引入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来刻画农村金融。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结合指标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本文选择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来作为刻画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1)农村金融规模(rfs)。对于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目前利用较多的是麦金农指标和哥德史密斯指标。麦金农指标是利用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衡量,哥德史密斯指标是利用农村存贷款总和与农村GDP之比来测算。但是,对于麦金农指标,一部分学者持有否定态度,胡振华等认为麦金农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农村金融的实践情况。因此,有学者采用哥德史密斯指标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王修华等^[29]、孙玉奎^[21]等选择金融机构存贷款与农林牧渔业比值的比率来作为金融规模的指标。借鉴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内容,本文选择哥德史密斯指标作为刻画金融规模的指标。在本文中,农村存款选择农户储蓄存款和农业存款之和来表示,农村贷款利用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之和来表示,用农村存贷款总额与农林牧渔业比值来衡量农村金融规模,其值越大表明农村金融规模越大。

(2)农村金融结构(rfc)。金融发展结构体现了农村金融资金的配置结构和资源分布结构。郭刚等^[30]在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时,利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来衡量农村金融结构。贾立等^[31]在测量农村金融成熟度中,选择乡镇企业贷款和农村贷款之比作为刻画农村金融结构的指标。借鉴这些学者的研究,本文选择乡镇企业贷款与农村贷款之比作为农村金融结构的指标。

(3)农村金融效率(rfe)。金融效率体现了金融发展的速度,大部分学者都采用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成贷款的效率来表示。丁志国等^[32]选择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的比值作为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林雅娜等^[33]选择存款和贷款之比来衡量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效率。同样地,本文采用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来衡量金融效率,使用农村存款和贷款之比来表示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农村存款与贷款比值越小,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速度越快,则金融效率越高;相反则说明农村金融效率越低。

3. 控制变量。

农村产业兴旺除了受农村金融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控制变量包括政府支农力度(gov),即用于农林事务水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地方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值;产业结构(str),表明该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即第二产业GDP与地区GDP比值;对外开放程度(open),表明该地区对外贸易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即进出口总额与地区GDP比值;自然灾害程度(natr),我国农村产业兴旺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因此将地区受灾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irr),表明该地区在农业发展中对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即有效灌溉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值。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农村产业兴旺、农村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等主要变量在不同的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2003—2019年期间,rib的最小值是2019年上海市的0.1173,最大值是2019年海南省的1.7877;rfs的最小值是2008年的西藏0.032,最大值是2015年的重庆市273.1;rfc的最小值是多个省份的数据缺省值01,最大值是2003年的上海市9.1126;rfe的最小值是多个省份的数据缺省值02,最大值是2015年的重庆市107.5。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如下所示,模型1、2、3分别是以农村金融规模(rfe)、农村金融结构(rfc)、农村金融效率(rfe)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农村产业兴旺进行基准回归。本文用以衡量农村金融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都是显著的。

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产业兴旺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农村金融规模的增长并未促进产业兴旺。由于我国长期偏向城镇发展和第二产业发展,金融资源更多倾斜于工业集中的城市,而农村地区则更多扮演了资金提供者的角色,金融资源的不平衡格局下规

模的增长对农村产业兴旺反而有抑制效果,这也与温涛等^[16]、许崇正等^[34]、孙玉奎^[21]等学者的结论一致;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产业兴旺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乡镇企业贷款占比越高,对农村产业兴旺有促进作用,表明对乡镇企业进行金融支持,能够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产业兴旺影响显著为负,即农村存款与贷款比例越高,意味存款向贷款的转化效率越低,对农村产业兴旺有明显抑制作用,这也与前文结论一致。

在此基础上,模型 4、5、6 是在模型 1、2、3 的基础上加上 robust 项以去掉干扰,三项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不变,结果更加显著了。模型 4、5、6 中,政府支出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对农村地区支出越高,对农村产业兴旺促进作用越大,这也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为正,说明地区产业外向程度对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有积极作用;自然灾害程度显著为负,说明自然灾害严重时会抑制农村产业兴旺,这与我国农村仍以农业为主的现实情况相符;农业灌溉水利用率在未加入 robust 项前显著为正,表明灌溉效率越高,农村产业兴旺越快,但加入 robust 项后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不改变其正向影响。

(三)非线性回归结果

在前述基准回归基础上,考虑到存在最优规模(结构或效率)的情况,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规模(结构或效率)的二次项: rfs^2 、 rfc^2 、 rfe^2 进行回归。

可以看到,关于金融规模(rfs)和其二次项(rfs^2)的结果显著,并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 U 型关系,说明金融规模对农村产业兴旺先抑制后促进。农村金融规模的初始增长是对农村产业兴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的,但随着规模持续增长抑制效应逐渐变为促进效应,意味着规模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服务,从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关于金融结构(rfc)仅为一次项显著为正,说明乡镇企业贷款占比对农村产业兴旺起到促进作用。

六、地区差异性分析

为进一步讨论我国空间异质性地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本文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别讨论,以探究地区差异是否对前述影响关系产生明显影响。以 rfs_1 、 rfc_1 、 rfe_1 分别表示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其余以此类推)进行回归。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模型 1 中农村金融规模显著为负,表明在东部农村金融规模的增长对农民产业兴旺有明显抑制作用,说明东部地区的城乡间金融格局失衡问题突出;模型 2 和模型 3 中的农村金融效率和结构均不显著,但政府支农力度、产业结构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农村地区加大支农力度、发展工业产业能够明显促进农村产业兴旺。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模型 4、5、6 中的农村金融规模、效率和结构均不显著,说明农村金融规模增长、效率提升和结构改善对农村产业兴旺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农村金融规模显著为负、结构显著为正、效率显著为负,不仅说明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城乡金融失调问题,即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累积却流向了非农村地区,也说明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向乡镇企业倾斜、存在更高的贷款存贷比(即资金转化效率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农村产业兴旺。

七、结论和建议

本文使用 2003—2019 年共 17 年的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农村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出发,构建农村金融与农村产业兴旺模型,实证检验是否存在最优的农村金融路径选择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1.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间金融格局不平衡, 金融资源失衡的配置使得金融资源更多从农村流入城市, 进而形成金融资源规模增长对农村产业兴旺的抑制效果; 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产业兴旺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乡镇企业获得金融资源提升能够带动农村产业兴旺; 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产业兴旺影响显著为负, 表明农村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非农村区域, 进而抑制农村产业兴旺。

2. 由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并非必然有效, 因此可能存在农村金融路径的最优选择。金融规模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 U 型关系, 说明农村金融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后, 由于更多金融机构下沉和金融产品丰富, 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步提高, 进而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由负转正。

3. 由于东部和西部的金融格局不平衡问题突出,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产业兴旺影响显著为负, 而西部地区分别在农村金融结构显著为正, 金融效率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问题更为突出, 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能更有效利用金融资源以推动农村产业兴旺, 也说明了农村存款转换至贷款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农村产业兴旺。

根据上述结论, 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快改变城乡金融不平衡格局, 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至农村地区。政府应制定农村金融规划, 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农村地区分支机构, 对农业项目和农业企业通过财政贴息、增加担保等方式进行扶持, 出台考核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力度。

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推动乡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首先, 财政部门应对乡镇企业应实施财政补助政策,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进而带动农村产业兴旺; 同时, 工商、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应加大对乡镇企业支持力度, 提升行政程序效率, 为乡镇企业构建良好经营环境; 最后, 乡镇企业应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证金融资源效用最大化。

3. 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应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 通过下沉机构网点或人员, 推出符合农村农业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 以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4. 不同区域间实施差异化的农村金融发展路径。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区域间, 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效果不尽相同。因此, 要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特点、金融格局现状、外向经济依赖程度等情况, 通过对农村金融规模、结构以及效率的差异性进行制度安排以达到对农村产业兴旺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柯风华, 杨强. 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路径研究——以鲁家村为例[J]. 农村金融研究, 2019(1):56-60.
- [2]贾晋, 李雪峰, 申云.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 2018(11):70-82.
- [3]吴比, 张灿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金融的需求[J]. 农村金融研究, 2017(12):40-41.
- [4]谭崇台, 唐道远.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全国 31 个省市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J]. 江汉论坛, 2015(1):5-10.
- [5]杨世伟. 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内在逻辑、现实境遇与实践理路[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5):16-24.
- [6]Farrell E Jensen. The Farm Credit System as a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J]. Appl. Econ. Perspect. Pol,

[7]Robin Burgess, Rohini Pande.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3):780-795.

[8]Rajeev Dehejia, Adriana Lleras Munez.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athways of Growth: State Branching and Deposit Insurance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 1940[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07(2):239-272.

[9]Robert G. King, Ross Levine.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3):717-737.

[10]Hans P. Binswanger, Shahidur R Khandker. The impact of formal finance on the rural economy of Ind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5(2):234-262.

[11]Khandker S R, Faruquee R R. The impact of farm credit in Pakistan[J]. 2003(3):197-213.

[12]赵洪丹, 朱显平. 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J]. 当代经济科学, 2015(5):96-108.

[13]丁志国, 徐德财, 赵晶. 农村金融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吗[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9):50-57.

[14]田杰, 陶建平. 农村金融密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我国 1883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2(1):108-111.

[15]冉光和, 张金鑫.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山东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6):47-51.

[16]温涛, 王煜宇. 农业贷款、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效性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5(2):78-83.

[17]朱喜, 李子奈.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信贷的效率分析[J]. 管理世界, 2006(7):68-76.

[18]王淑英, 孙冰, 秦芳. 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9):196-204.

[19]刘玉春, 修长柏. 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9):92-100.

[20]张宇青, 周应恒, 易中懿. 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11):50-56.

[21]孙玉奎, 周诺亚, 李丕东.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 2014(11):90-95.

[22]王婧磊.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J]. 经济研究导刊, 2012(35):27-29.

[23]余新平, 熊晶白, 熊德平.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6):77-86.

-
- [24]谭燕芝.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关系的实证分析:1978—2007[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4):50-57.
- [25]张乐, 黄斌全, 曹静. 制度约束下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4):71-83.
- [26]胡振华, 陈恒智. 农村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6):63-68.
- [27]陈时兴. 农村地方金融结构、地方政府行为与支农绩效[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3):81-90.
- [28]任碧云, 姚博.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3(11):45-51.
- [29]王修华, 关键. 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水平测度与收入分配效应[J]. 中国软科学, 2014(8):150-161.
- [30]郭刚, 王雄. 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基于 2002—2011 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 系统工程, 2012(10):86-91.
- [31]贾立, 汤敏, 胡晶晶. 中国农村金融成熟度的测量与实证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7(1):21-28.
- [32]丁志国, 张洋, 高启然. 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因素识别[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3):4-13.
- [33]林雅娜, Christopher, 谢志忠.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对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县级农村信用社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1):85-97.
- [34]许崇正, 高希武. 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支持状况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05(9):173-185.

注释:

1 缺省值为 0 是由于部分年份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缺乏。

2 缺省值为 0 是由于部分年份农村存款数据缺乏。